

“新”新经济地理学：继承与创新*

年 猛^a, 王 焱^b

(中国社会科学院 a.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b.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005)

摘 要: 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长期缺失空间维度, D-S 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 “新”新贸易理论则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基于微观异质性, “新”新经济地理学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其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三大分析框架, 即 D-S 垄断竞争分析框架、OTT 分析框架和 BEKJ 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应积极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 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 从简单的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优化路径。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学; 新贸易理论; “新”新经济地理学; “新”新贸易理论; 企业异质性; 空间格局; 区域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61.5; F09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 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等, 2012)。然而, 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 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 1991a), 而且难入主流。目前, 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则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 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 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 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 2009)。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 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 尤其是近年来, 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 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 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 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 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 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 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 “18 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 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 1800 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

* 收稿日期: 2016-09-18; 修回日期: 2016-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作者简介: 年猛(1983—), 男, 安徽宿州人; 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王焱(1985—), 女, 河北石家庄人; 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就职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 19 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期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①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 1995, 1998a, 1998b; Fujita et al, 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 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 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r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 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 年，Krugman 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 D-S 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 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 年，Krugman 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②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 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 1991 年 Krugman 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 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 创立的 C-P 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业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 Krugman 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 “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 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 NNTT）研究浪潮。NNTT 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

① 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 H-O 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② “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 Samuelson 于 1952 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 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 Krugman 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 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美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 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 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 D-S 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美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 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 和 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 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 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 1991b）建立的 C-P 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外围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①，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外围”（中心是工业区，外围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 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 Krugman 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 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 FC 模型）（Martin et al, 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 FE 模型）（Ottaviano, 1996; Forslid, 1999; Forslid et al, 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 CC 模型）（Baldwin, 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 GS 模型）（Martin et al, 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 LS 模型）（Baldwin et al, 2001）、中心—外围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 CPVL

^①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模型)(Krugman et al, 1995; Fujita et al, 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 FCVL 模型)(Robert-Nicoud, 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 简称 FEVL 模型)(Ottaviano et al, 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 框架”^①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 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现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 LFC 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 LFE 模型)(Ottaviano et al, 1999; Ottaviano, 2001; Ottaviano et al, 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外围”现象。以“DCI 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 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 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 和 Okubo (2006) 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 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等, 2016)。2011年，Ottaviano 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 2011)^②。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 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 NNEG 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③。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代理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 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 2006; Okubo et al, 2010; Behrens et al, 2014)。

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① “DCI 框架”是指以 D-S 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② 借鉴 Baldwin 和 Robert-Nicoud (2005) 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 (2011) 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③ 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 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et al, 2006, 2009); 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 (Behrens et al, 2014); (3) 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 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 (Baldwin et al, 2006, 2009; Baldwin 和 Forslid, 2010)。

2. “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 D-S 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 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 D-S 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 和 Krugman (1999) 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 D-S 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 Baldwin 和 Okubo (2006) 在 D-S 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 D-S 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 (Behrens et al, 2014)。

(2) OTT 分析框架。OTT 分析框架是由 Ottaviano、Tabuchi 和 Thisse 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 (Ottaviano et al, 2002)。与 D-S 框架相比, OTT 框架一方面克服了 D-S 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 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 CES (不变替代弹性) 效用函数, 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 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 框架一经推出, 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8) 采用 OTT 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 (Okubo et al, 2010) 也基于 OTT 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 BEKJ 分析框架。BEKJ 模型由 Bernard、Eaton、Kortum 和 Jensen 等建立 (Bernard et al, 2003) 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 BEKJ 模型仅仅关注 Frenchet 分布, 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 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现状及启示

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 (杨开忠等, 2016), 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 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数据可获得性较差,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 (李福柱, 2011; 颜银根, 2013; 陈光, 2015; 杨开忠 等, 2016), 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 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 (刘海洋 等, 2015) 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梁琦等, 2012、2013; 王文雯等, 2015) 等方面。同时, 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 (2011) 指出,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 不是现在, 更不是未来”, 但是对于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 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 (孙久文 等, 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 结合中国经济实际,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 “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 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 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 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 “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 “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 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 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 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 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 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 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

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参考文献：

- 安虎森.2009.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安虎森.2010.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陈光.2015.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4）：160-166。
- 李福柱.2011.“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6）：98-102。
-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 梁琦，李晓萍，简泽.2013.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J].统计研究，30（6）：51-57。
- 刘海洋，刘玉海，袁鹏.2015.集群地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识别：集聚效应抑或选择效应？[J].经济学（季刊）（2）：1073-1092。
- 年猛，孙久文.2012.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89-96。
- 孙久文，原倩.2015.“空间”的崛起及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88-95。
- 王文雯，金祥荣，朱希伟.2015.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J].统计研究（7）：32-36。
- 颜银根.2013.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从新经济地理到新新经济地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3-12..
- 杨开忠，董亚宁，薛领，等.2016.“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5）：63-74。
-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2）：253-280.
- BALDWIN R E,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1）：5-37.
- BALDWIN R E, FORSLID R, MARTIN P, OTTAVIANO G, 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LDWIN R E, 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2）：161-176.
- BALDWIN R E, 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3）：323-346.
- BALDWIN R E, 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4）：741-764.
- BEHRENS K, DURANTON G, 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3）：507-553.
- BERNARD A B, EATON B, KORTUM, 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4）：1268-1290.
-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IT A K, 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3）：297-308.
- DURANTON G, 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4: 2063-2117.
-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 FORSLID R, 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 - 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3）：229-240.
- FUJITA M, KRUGMAN P, 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209-251.
-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7（4）：482-490.
-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4）：469-479.
-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950-959.
-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83-499.
-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651-667.
-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KRUGMAN P, 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857-80.
-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4（2）：7-17.
- KRUGMAN P. 1998b.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2）：161-174.
- KRUGMAN P. 2011.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 45（1）：1-7.
- MARTIN P, 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9: 335-351.
-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2）：281-302.
-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 1695-1725.
- MELITZ M J, 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1）：295-316.

- OKUBO T, 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 OKUBO T, PICARD P M, 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2 (2): 230-237.
-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31 (1): 51-77.
- OTTAVIANO G I P, 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3 (3): 429-456.
-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1 (1): 51-77.
- OTTAVIANO G I P, TABUCHI T, 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3: 409-436.
-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1): 213-240.
- ROBERT-NICOUD F. 2002. A simple geography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nd capital mobility[R]. LSE, mimeo.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NIAN Meng¹ WANG Yao²

-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short of spatial dimension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its shortage of suitable technical tools, the emergence of D-S model and the foundation of new trade theory lay the technical basis for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hich only focuses on macro heterogeneity but which lacks of microscopic heterogeneity, however, 'new' new trade theory provides microscopic theory basis for the producing of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heterogene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romotes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hose theoretical model is mainly based on three analytic frameworks such as D-S monopoly competition analytic framework, OTT analytic framework and BEKJ analytic framework.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ctively use brand-new research vision and methods of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deeply study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optimal path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ies by combining China's reality from simplicity to application and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Key word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w trade theory;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w' new trade theory; firm heterogeneity; spatial pattern; regional economics; spatial economics

CLC number: F061.5; F09 **Document code:** A